

诗性智慧丛书

刘士林 主编 廖明君 著

生死攸关

——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

诗性智慧丛书

刘士林

主编

廖明君

著

生死攸关

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刘士林主编 廖明君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诗性智慧丛书)

ISBN 7-5060-2056-4

I. 生… II. ①刘… ②廖… III. 李贺(790~816)-唐诗-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015 号

生 死 攸 关

SHENG SI YOU GUAN

——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

刘士林 主编 廖明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79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60-2056-4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主编人语

生死攸关

在和二三友人经过几年努力之后，像这样的一套属于稀有品种的小丛书，终于要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作为主其事者的我在稍舒一口气的同时，内心深处更多的却是一种“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酸楚感。如果考究其因，则可以“诗性智慧”——这个在当下只有很少人才能真正谈论与切身体验的概念——一语概之。

屈指算来，从我最初使用这个概念至今，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而最初使用它的学术背景以及自己当时的生活情境，则是我每次在使用它时都会感到隐痛与酸楚的原因。就前者来说，当时正值以理性智慧为深层结构的西方学术思潮的鼎沸期，甚至诗性智慧这个概念本身都直接来源于维科的《新科学》，并在它的现代阐释中蒙受了过多的海德格尔话语的影响。需要怎样的努力与什么样的机遇，才能从十几年前那种精神生产背景中抽身出来，或者说在这个向中国诗性智慧回归的路途中，曾经侥幸躲避了多少知识的陷阱与思想的歧路，这是连亲历者本人也不能一一道来的。只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有一阵阵令人目眩心悸的后怕感袭来。就后者而言，那更是一段携带着沉重精神负担的青春思想历程。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分不走运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天性中某些诗性基因的促动而极其偶然地撞开了这一扇门。如我在《中国诗哲论》中写到的这段话：“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

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是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像这样一种类似西方哲人所谓“天启知识”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它们从何而来。而特别是想到自己当时生活空间的逼仄与学术身份的卑微，我就更乐于把它看做是对自己坎坷青春的一种相应的回报。如果没有天性中昏睡的诗性智慧机能，如果没有西方知识对这种昏睡本能的刺激与锤炼，甚至是如果没有在开封那一段“安贫乐道”的读书与思考生活，后来的一切或许根本就不可能有生成的机缘。而在今天禁不住再一次旧事重提，则纯是因当年那种人在边缘的存在方式，与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存在与命运有一种深刻的家族类似性：一方面是西方文明已经从抽象哲学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民族的诗性智慧机能在当代大众文化中正在走向彻底的遗忘。而在当下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背景与条件，也许恰好可以为这套小丛书的存在与意义做一个旁注吧。

关于中国诗性智慧的深层机制与基本原理，我在《中国诗哲论》、《中国诗学人类学》以及《中国诗性文化》三书中已有比较详尽的阐释。而设计这样一套《诗性智慧丛书》的目的，则是希望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背景与人文对象上，把诗性智慧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和全面关系进一步展开。困难与困境是在所不免的。一方面，这个理想当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在这个“滔滔者皆西方话语者”、同时整个社会又被纳入“敌视诗”的消费文明框架之下的时代中。另一方面，无论是对未经现代理性启蒙依然保持着传统实用理性机能的“旧人”，抑或是

在现代启蒙历程中仅仅开启了工具理性程序的“新人”，由于他们对诗性智慧本身共同的隔膜现状，因而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难以谈清楚和深入的。但是，由于诗性智慧在逻辑上可以解除两种“异化”，即由于知识机能过于发达而导致的“理性异化”以及由于伦理机能过于膨胀所导致的“伦理异化”，因而出于平衡生命结构自身的内在需要，从尘封的生命意识中努力开掘诗性的甘泉，从僵化的生命行为中寻找诗性实践的机理，也就成为解读、阐释和重建中国诗性文化及其诗性精神的全部理论与现实需要的根据。以中国诗学和诗人特有的诗性智慧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打开一种“别具一格”的中国思想史新视野，有效地纠正当代思想史研究中过于浓郁的“西方化”倾向，为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精神结构提供新的材料和方法，而且作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民族化和建设性之努力，它对于重新评价与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时代意义，也无疑可提供一种具有重要现实感的人文思路。

以上述这样一种现代性理念为精神原创的基础，再辅以一种我们称之为诗性话语的中国话语方式，努力揭示那埋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有着永恒魅力的中国诗性文化的智慧与精神，使当代人日益干瘪的审美机能获得一种可以健康生长的诗性空间，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理想与目标。或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是为序。

刻士林

2003年9月27日

于南京白云园寓所

目 录

主编人语 刘士林 1

导论·生命的诗意图 1

1. 诗人何为:生命·哲学·诗歌 3
2. 我心伤悲:生存状况与生命历程 6
3. 我是谁:追问生命 9
4. 上下求索:时空变换与生命形态转换的哲学意蕴 15
5. 结语 18

一·长风破浪会有时 21

——增加生命亮度的功名追求

1. 少年心事当拿云:追求功名的心路历程 22
2. 凌烟阁上万户侯:功名与生命亮度的增加 25
3. 功名富贵无凭据:功名与生命的哲学关联 29
4. 呼龙耕烟种瑶草:超越功名的天国生命 37

二·极宴娱心意 41

——享乐的生命哲学底蕴

1. 人间酒暖春茫茫:追求享乐的文化背景 42
2. 斗酒相娱乐:享乐的生命哲学透视 44
3. 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增加生命密度的享乐追求 50
4. 琼钟瑶席甘露文:天国中的享乐 63

三·怀忧终年岁 71

——苦难意识的生命意义

1. 来日大难：苦难意识的文化审视 72
2. 二十心已朽：自我生命的苦难叙说 74
3. 人生有穷拙：人生苦难的哲学意蕴 79

四·盈盈一水间 91

——爱情的生命观照

1. 阿侯系锦觅周郎：爱情的憧憬与追求 92
2. 无物结同心：爱情的痛苦与悲伤 103
3. 青洲步拾兰苕春：天国中的爱情展示 110

五·古来征战几人回 115

——刀光剑影中的生命审视

1. 将军振袖拂剑锷：传统追溯 117
2. 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与死亡 122
3. 功名只向马上取：战争与功名 132
4. 美人帐下犹歌舞：战争与享乐 134

六·天若有情天亦老 139

——历史深处的生命印痕

1. 披书案将朽：历史·生命·功名 141
2. 秦宫一生花底活：历史·生命·享乐 145
3. 何名作莫愁：历史·生命·爱情 154
4. 铜驼夜来哭：历史·生命·死亡 161

七·行行重行行 167

——寻找生命的家园

1. 归去来兮：离乡与返乡 168
2. 鬼灯如漆点松花：从故园到鬼蜮 182
3. 溪女洗花染白云：天国人间 189

八·风飘万点正愁人 195

——生命的有限与无限

1. 去日苦多：人生短暂的诗意图探询 196
2. 人寿百年能几何：生命有限的诗意图抗争 201
3. 劫灰飞尽古今平：突破有限性的永恒追求 208

九·松柏冢累累 215

——死与生的探求

1. 羞见秋眉换新绿：来自死亡的生命压迫 217
2. 雨冷香魂吊书客：关于死亡世界的执著探究 220
3. 恨血千年土中碧：追寻死亡的哲学意义 229

十·瑶佩相逢桂香陌 233

——生命的渴望与理想

1. 延寿保无疆：永生的向往 234
2. 王母桃花千遍红：永生的世界 242
3. 粉霞红缓藕丝裙：甜蜜的爱情与永恒的生命 247
4. 飞香走红满天春：理想的生命家园 251

十一·神嗔神喜师更颜 253

——生命的原初颤动

1. 六街马蹄浩无主：狂热的时代风尚 254

2. 彭祖巫咸几回死：对道教的理性认知 256
3. 愿携汉戟招书鬼：道教·生命·诗歌 260
4. 漆炬迎新人：死与生的深层探究 268

十二·遥望齐州九点烟 279

——尘世与仙界的生命转型

1. 长绳系日乐当年：生命·太阳·时间 281
2. 翻翻一仙人：从有限到无限的生命转换 286
3. 玉宫桂树花未落：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伊甸园” 294

十三·几处吹笳明月夜 299

——诗与乐的生命共鸣

1. 锦城丝管日纷纷：历史追溯与时代背景 300
2. 长歌续短歌：音乐对李贺及其诗歌的影响 304
3. 歌成鬓先改：音乐与生命的哀伤 307
4. 哀歌恸鬼神：音乐与鬼域及天国的文化关联 316

十四·杜鹃口血老夫泪 325

——意象营造与组合中的生命意蕴

1. 黑云压城城欲摧：富于生命个性的意象选择 327
2. 小白长红越女腮：充满生命张力的意象组合 332
3. 忆君清泪如铅水：饱含生命内蕴的意象创造 338

结语·生命的悲剧意识 343

1. 第一重悲剧意识：仕途艰难的心灵哀伤 344

2. 第二重悲剧意识：物质贫乏与疾病缠身的生存苦痛 351
3. 第三重悲剧意识：追问苦难、享乐、死亡等问题的意蕴所在 357
4. 第四重悲剧意识：建构超越苦难与死亡的生命乐园 369

附录 · 绚丽凄美的生命之花 373

——李贺与波德莱尔比较研究

1. 坎坷人生路 374
2. 生命诸多问题的诗意图探 379
3. 生命的花朵 390

后记 · 追问生命 393

导论 · 生命的诗意图

生死攸关

短命的、以“诗鬼”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惟一的“鬼才”诗人，他早熟、早夭，一生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进而颇感苦闷、伤感，并由此而展开对生命的探寻与追问。其诗篇因多富于神奇独特的色彩而被视为人间罕见的“鬼”诗，在中国诗坛的锦花繁朵中独树一帜，成为骇世惊俗的艺术奇葩，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其学术名著《谈艺录》中就曾以较大的篇幅来探讨李贺诗歌；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视李贺为一位一千多年前象征派、意象派的极具现代性的诗人；一代伟人毛泽东终生推崇李贺诗歌，认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我们认为，只有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借鉴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神话学等理论，抓住李贺对人类生命之功名、享乐、苦难、爱情、死亡、永恒等种种问题的追问这一关键，才能揭示出李贺诗歌内在的哲学意蕴和精神实质之所在。大体上说，李贺是以东方人的思维和中国人的诗性智慧，运用极富艺术魅力的诗化语言，围绕人、鬼、仙三种生命不同的状态，通过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尘世、鬼域、天国的建构来完成特定的时空转换，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生命哲学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作出了精彩的极具个性的回答。

1. 诗人何为：生命·哲学·诗歌

尽管文学与哲学在本质上存在根本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不少人就认为文学欣赏的灵魂是哲学。由此可见，以文学欣赏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自然也应该注意到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而不应忽略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评论作家的文学创作。

一般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着历史、语义、语意、意象、哲理等几个文化层面，其中又以哲理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较为重要。而在一切文学体裁中，又以诗歌和哲学的关系最为靠近最为密切。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的极致就是诗，而优秀的诗人，也必然具有哲学的气质和修养。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得好：“毫无诗意的哲人未免失之枯燥和严峻。反之，耽于个人经验而不能提升为普遍真理的诗人，也难成大家。”^①纵观中外诗歌名篇，其境界多为诗化的哲理意境。缺乏哲理的玄思，则诗歌将因缺少哲理思辨的深度和缺乏对人生作整体的哲理性把握而导致浅浮与平庸。只因为，“诗虽然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在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②古希腊诗哲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准确：“诗是一种比历

^① 见《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② 朱光潜：《诗论·中西诗歌情趣比较》，《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史更富有哲学意义、更高的东西，因为诗要表达带普遍性的事物，而历史则表达特殊的事物。”^①遗憾的是，由于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我们的古代文学批评很久以来便多是把诗歌看做政治、历史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翻版，而往往忽略蕴含于其中的哲学意蕴。这一点，在对李贺诗歌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先对李贺诗歌作出评论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以诗意的语言概述了李贺诗歌的艺术风貌之后，却又以屈原的作品作为参照系，认为李贺诗歌“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怨刺，言及君臣理乱，时有激发人意”，并透露出时人亦持同样看法：“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②可知在唐代，人们就已经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李贺诗歌具有不可否认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地位，但却又常以儒家诗教及传统的诗学理论来衡量李贺诗歌，认为其多是“少理”之作，从而为之惋惜不已。从那以后，尽管“少理”之说未成定论，却也成为了评论李贺诗歌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以史证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不少论诗者曾用来为李贺诗歌的“少理”竭诚辩护，认为李贺诗歌不仅没有少理，而且是中唐社会的具体反映，具有极大的教化美刺作用。这种看法，以清人姚文燮为代表。姚氏认为：“此昌谷之诗，即昌谷之史也，一字一句，切靡时政。指玄而义隐，深得小雅怨诽不乱之意。是少陵、乐天、昌谷诗不同，而所以为诗则一也。”^③“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

^②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见《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4页。

^③ 《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第382页。

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①为此，姚氏不惜穿凿史料，故作深解，以所谓索隐家的“慧眼”去挖掘李贺诗歌与历史上实有人物、事件之间的隐秘关系，企图还其“史诗”的面目。此说与“少理”之说针锋相对，企图抬高李贺诗歌的地位，但由于本证不足，旁证又不具备，实有牵强附会之嫌，从而为不少学者反对。今人钱钟书先生便对姚氏的“以史证诗”作过中肯的批驳。钱先生最后得出结论：“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②这实际上乃是“少理”说的又一衍变。

以上种种，或褒或贬，或誉或毁，在本质上却都是以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来审视李贺诗歌。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儒家诗教是人们批评文学艺术的惟一准绳。它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一般都是从政治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审视；由此而形成的文学思想，便是主张文学乃社会政治、伦理的反映，从而忽略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忽略了生命的本质性、普通性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还应认识到，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作为它的反映的文学自然也是多姿多彩的。因而，“以史证诗”不应该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的文学批评方法。否则，文学便必然要失去其自身的特质而成为历史的附庸；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会逐渐变得单调呆板而丧失效用。对李贺这样经历短、涉世浅、情感强烈的主观诗人及其诗作，我们应该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根据文本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评判，而不应一味将之作为历史事实、人物活动

^① 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7 年，第 368 页。

^②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46 页。